

明代嘉靖间刑部的文学活动

张德建

提 要 本文从嘉靖中期后七子刑部结社之初的政治环境入手,探讨文学活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首先,对嘉靖前期刑部结社的政治背景、刑部职掌及工作环境进行考辨,认为将结社活动归于刑部“清简”是不准确的。又对王世贞及七子的政治活动进行简要疏理,并将他们的文学活动置于嘉靖以来学术风尚、政治风气的变迁之中进行分析,研讨他们选择文学作为人生目标,并逐渐疏离政治的过程。后七子不仅置身政治斗争之中,同时也承受着政治文化的压力。最后,通过对七子有关文学功能的论述探讨七子文学观念的形成,并对政治精神的变化进行研讨,正是在此背景下,刑部的文学活动才可以得到理解。

关键词 刑部 嘉靖 文学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体系中,文学与政治是一对有着天然联系的子系统,并且随着时代不同,思想文化的变异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所关注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明代文人经历了一个由统一于理学与政治混合体构成的文化之中,自我服从政治,到对自我情感的强调,以激烈慷慨之气投身政治,结果却遭到官场的抛弃,逐渐疏离政治,再到以对个体自适和生命解脱的追求为人生目标,主动远离政治的过程。研究这一历程,对我们理解明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嘉靖间刑部文学活动的研究为切入点,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早期明代文学创作主体是台阁文人,其他官员很少从事文学活动。吴宽《公余韵语序》:“士大夫以政事为职者,率早作入朝,奏对毕,或特有事则聚议于庭,退即诸署率其属以治公务,胥吏左右持章疏,抱簿书以次进,虽寒暑风雨不爽。当其纷冗,往往不知佳晨令节之已过。盖勤于政事如此,又何暇于文词之习哉!”^①这种情况直到弘治年间才发生变化,皇帝的开明,海内太平的局面与右文政策、宽松的政治氛围,共同造就了弘治间的文化环境,李梦阳《熊士选诗序》:“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咸得大肆力于弘学,於乎!亦极矣。”^②心态的放松使他们“咸得大肆力于弘学”,开展一系列的文学活动,造成了文学创作繁荣的局面。很多人指出这也与当时郎署工作的闲暇状态有关,

^① 《家藏集》卷4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空同集》卷5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如徐九皋称“敬皇帝缙绪御寓,昭德广化,函夏敕宁,蚩蚩率俾,亭徼释警,干戈载戢,学士大夫乘时清燕,群聚率励,蹊探远剖,大肆力乎文事。”^①王慎中《杭双溪诗集序》:“敬皇帝时,治化熙洽,士大夫以名行相高,天下敦庞无事,士者乐于闲暇而有和平之风,故得大肆于文学。”^②这说明在时人心中,弘、正间郎署文学的兴起与这种开明、激昂的政治氛围和郎署官员职思清简有密切关系。

后七子文学活动起于刑部结社,也与刑部事务清简有关。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意不可一世。而属居曹无事,悉取诸名家言读之。”^③欧大任《梁比部传》:“乃授比部郎……居曹无事,得以博综邃学,多所撰著。”^④殷士儋说李攀龙“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既曹务闲寂,遂大肆力于文词。”^⑤王世懋《欧桢伯西署集序》:“廷尉署与比部鳞比而西,故皆得称西署。比部事简而徒众,诸郎多肆力为文章,若李、徐辈及余兄元美先后声施矣。”^⑥可见刑部署事清简是大家共同的想法。刑部之曹务清简与刑部的设官分职有关,王樵《西曹记》云:

国初稽古建官,正六卿之职。以钱谷刑狱为视诸司为剧,故分其子部各十有三,如外藩之数。承平以来,讼狱稀简,西曹号为无事。郎官日以其三时治事,而以其余挟策读书。晡衙既散,桧荫寂寂,静如太古,有留而弗去者焉。他曹僚友不常接,接或以迹相拘,不能相洽。唯西曹燕叙以齿不以官。事至分理,有疑相酌。政事之外,道义切磋,真有朋友之义焉。^⑦

认为刑部“讼狱稀简”,“号为无事”,所以造就较为宽松、自由的空间,直接影响到文学活动。到了万历年间,人们谈起七子刑部结社的时候,也仍然认为与刑部事简有关,袁宏道《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西曹旧称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饰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缓带而谈艺,竟为复古之词,以相矜尚。一时学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连光景,鼓吹骚雅,诸曹郎望之若仙,故当时西曹视他曹特易。”^⑧刑部曹务闲寂被视为后七子开展文学的一定条件。但嘉靖间刑部的清简与弘治间郎署的熙洽清燕不可同日而语,弘治间郎署文学的兴起是政治清明的产物,但嘉靖年间,却是另一番局面,嘉靖皇帝先是以“大礼议”与群臣展开的激烈斗争,后又一意修玄,使权奸当道,导致政治风气彻底改变。《明史》:“世宗朝,璉、萼、言、嵩相继用事,六卿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湮溺取容。”^⑨因此,单纯的闲寂是否一定会产生文学活动,并进而形成文学集团,则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将其视为后七子兴起的重要原因时。

因此,尽管嘉靖、万历间不断有人强调后七子文学活动与刑部的关系,但依据常理,我

① 《孟有涯集》卷首《刻孟有涯集序》,嘉靖十七年王廷相刻本。

② 《遵岩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遵岩集》卷9,第689页。

④ 《欧虞部集·文集》卷15,清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⑤ 《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志铭》,《李攀龙集》附录,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86页。

⑥ 《欧虞部集·西署集》卷首。

⑦ 《方麓集》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瓶花斋集》卷6,《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8页。

⑨ 《明史》卷202《赵炳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49页。

们却不能相信这是后七子文学活动的主要动因,而只能由此断定刑部的官务清寂为刑部官员提供了一个相对丰富的时间和较自由的空间,使他们可以从事文学活动。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解读上述材料中关于后七子刑部文学活动的信息?职务清简、办公环境在政治生活中当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精神和心态,这才是决定官员政治作为的关键,也是我们探讨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二

实际上,刑部的环境很难说适合诗酒风雅,赵时春在一篇文章里为我们提供了刑部经历的细节。《养鱼池记》:“刑部事于诸曹最剧,部置狱置(字迹不清),以诸司主事主之,监察系囚之出入,月更其人。”他莅事之时,“桎械满前,呻吟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左右皆湫隘,未有纵余观而适余者。”^①屠应埈《送饶子闻之江南虑刑序》也说饶子闻“比服官西曹,累囚陈道,圜土之中,关三木曳当郎者百十为群,崩角抢地,呼号之声相闻。于是倾耳洞目,掩袂而反走。心惨惨焉,归卧数日犹弗能平也。”^②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文学是十分不易的事,需要有极高的忍耐力和淡于名利的精神,费宏《半江赵先生文集序》:“官西曹,有吏责,日亲朱墨敲朴之务,而复乘其余暇,肆力于经史百氏之书,恬于世利,甘守常调,拔乎流俗,视求田问舍之事,若将浼焉,而独汲汲于问学文章,不啻嗜欲饮食,兹非所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而无迷无绝者耶!”^③明代监狱之惨酷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上述文章也只是含糊言之。《明史》等典籍对明代监狱的黑暗有详细的描述,^④在囚犯的惨叫声里,哪里还有心情诗酒唱和呢?

另外,从相关史料和文人记述来看,刑部职掌非常繁重,为了保证刑法和诉讼的公正,明太祖不仅多次更律令,还制定了讯囚制度,由中央政府定期派出刑部官员和按察御史审定案件,平反冤狱。嘉靖年间大狱屡起,刑法混乱,刑部职任是相当繁重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描述,如屠应埈《送姚大夫守金华叙》云:

司寇职总天下刑狱,凡简孚听阅,明允奏讞之繁寔倍他部,其致刑条格命之天子者,岁有益损,多遗亡之忧,故郎署之明故实,平比服者,僚采质之以稽厥中,其铨衡亦重以外补。^⑤

皇甫汈《送卢法曹榘考绩序》云:

夫刑匪推鞠之艰,而其弊有二焉:若夫豪右作慝,雄张京邑,踰轨奸究,怙势以逞,请寄漏脱,主者谁何!法斯挠矣;专事苛轹,巧文附会,穷抵横入,不能贷恩于无知,原

① 赵时春《赵浚谷文集》卷1,万历八年周鑑刻本。。

② 屠应埈《屠渐山兰晖堂集》卷8,明嘉靖三十一年屠仲律刻本。

③ 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14,明嘉靖三十四年吴遵之刻本。

④ 如《明史·杨爵传》云:“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拷掠,血肉狼籍,关以五木,死一夕复甦。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鞫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许纳粮饮食。屡濒于死,处之泰然。”杨爵《杨忠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周主事传》云:“初五日械系下狱,十二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复蒙笞,且备极拷掠,血淋漓,衣前襟尽成赤紫色。桎梏枢锁昼夜,困苦间伺,惊惕罔敢疎宽。至卧处,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袜苦之类为血所沾,若滞于水中。”

⑤ 屠应埈《屠渐山兰晖堂集》卷8。

情于株梁,刑斯滥矣。^①

由此可知,从刑法条文的制定到刑法工作的弊端以及民风、政风的变化,都表明刑诉是一项极为繁重复杂的工作,刑部并非如诸人所说的那般清简无事。从事刑部职掌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需要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迅速熟悉律条例令,又要面对权势贵要的挟请,尤为不易。陈文烛《赠司理房公序》:“今天下何所难哉?折狱为最,料敌次之,故大刑用兵甲,次斧钺刀锯,次鑽凿鞭朴,是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其致一而已。第讼者诈伪百出,如牛毛,蝟刺莫能指数,故防民之伪甚于防虏,非公且明乌能胜其任乎?”^②

王世贞为同部官员写了很多送序,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窥见刑部职任之艰,绝非清简。如《弇州四部稿》卷56《送比部吴峻伯江西恤刑序》云:

吴子穷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损,复之刊布,著为法式。夫吴子儒术、吏法斤斤精至如此,其何有江西哉!

《弇州四部稿》卷55《送王员外新甫视广西学政序》云:

新甫拜刑部主事,时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读之,精心为谏。尚书心已重新甫,俾阅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属重者、挟势者、冗弗竟者辄问王主事云何具以对?尚书得新甫对未尝不为起称善也。

《弇州四部稿》卷55《送袁履善郎中审录广西序》云:

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数更起大狱,佐其长剖析平亭,咸颂不冤。三载,论囚还,进郎中,曹有异狱号枉,而或多所牵畏,再更案弗究,独一二语出之。众欣然谓袁子当称是亡愧。^③

吴峻伯即吴维岳,王新甫即王宗沐,袁履善即袁福征,三人都是先于王世贞于刑部结社酬唱的主要成员。从王世贞的记述看,刑部事务极为繁杂,非精熟律条不可,故吴维岳“穷日夜力校勘情法”,王宗沐“日夜奉三尺读之”,以此诸人皆长于律法,精于为谏。

由此,我们发现对明代嘉靖间刑部职掌的描述是相互矛盾的,一者认为刑部事务清简,一者则认为刑部繁重复杂。如何解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材料呢?我们认为这是个体的人生追求决定的。而个体的选择不仅受文化传统的影响,现实政治现实也会对士人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对孝宗至武宗朝政治风气和士人气节的变化,王世贞从官场手段变化的角度做过详尽的描述,《弇州四部稿》卷57《赠袁抑之给事迁福建按察僉事序》云:

父老称孝皇帝朝每给事、御史上殿,则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而是时上明法度,人自奋羔羊之节,亡选行何恐也?岂给事、御史为操切激印,耸动人主耶?然足以明谏官之势尊,其默折逆消,预于衰计深矣。至武皇帝而始有坐紃弹不当意,斥重且及苔钳为城旦而士伍。未久辄复贵,贵或先,其无故抑者卒不胜其伸者,而名益重。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为地,为上启威胜之说,一不当,终其身不复举。然海内之士争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罢,贤也。士议与吏议持,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计以终不能断绝,乃益务为含容输款,及亡素以蛊惑上,使弗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发其

① 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4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二酉园文集》卷4,明天启三年陈之蓬重刻本。

③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端而人自故,天下骇其祸亡其繇,以为当被者噤塞莫陈,而豪杰之士渐解体不复振。甚或不胜愤其奸,力攻之语非重不达,重即天子以为小臣暴横亡状,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当其仇者,天子也。呜呼,吾仕七载,而乃闻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见者迹之,大抵后所谓耳。

面对这样的局面,嘉靖间正直士大夫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讲求治世经济之学,唐宋派中人大多以讲求实学著称于世,如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等;一是后七子,虽不乏对现实的关注,如王世贞写出了著名的《乐府变》,但却是以文学名世。

周鑑《明御史中丞浚谷赵公行实》称赞赵时春说“丁亥(嘉靖六年)除刑部河南司主事。已丑,调兵部武库司主事。公以郎署简逸,日惟读书赋诗,遇职事则必秉公信法,不畏强御,不徇请託。与海内有志之士讲经济实学,搦管论文,抚剑悲时,议论风生,若决河注海,听者亹亹忘倦。谓国家承平日久,文散武弛,寇戎将炽,豪俊习骑射,谈甲兵,低昂古今,品评人士,至于象纬、数术、钱谷、屯盐诸制罔弗根极要领,图为久安长治。”^①嘉靖三十七年,王慎中任户部主事,“时天下承平,在仕者皆高重宴嬉,以米盐为末务,有据案执簿稽敛,散会盈缩已为充职。先生独慨然曰:‘国家大计系于转输,若吏徒保甲,习玩诛贿,乾没为奸利,恬无所创,非法也。’弊窦奸萌,搜室抉剔,积偷宿蠹,厘革殆尽。且以其余闲读古五经六典子史之书,隆寒盛暑皆夜分不寐,即书生苦刻不能及。作为文章彬彬然史汉人语,唐之诗,晋之书罔不涉其流而泝其渊,遂知名当世。”^②赵时春、王慎中等,主张讲求经济实学,反对诗酒风雅。而嘉靖二十六年前后官于刑部的后七子成员却以诗酒风雅知名当世,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徐学谟《周胤昌集序》云:“昆山周胤昌先生起家嘉靖庚戌进士,而是时郎署诸公咸抵掌而谈诗,其诗务极绮靡,争单词只句之雄,转相剿袭为名高。其音响激越,殊愉快人耳。以是海内少年争驰骛之。”^③

可知为官闲暇之余,从事读书是文人的普遍选择,但努力方向却并不一致,选择专力为政,则精研经济实用之学,最起码也要做到熟悉法律及相关行政事务;选择作为一个文人,则可以在做官的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前者是儒家经世思想教育和政府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历来得到公平的支持和良好的评价;后者则从儒家的文治思想找到支持,自台阁文人的“余事为文”说,到后来倡导的“以文学饰吏治”都可能获得某种支持。甚至某些文学之士易于通过文学获得声名,对官场升迁反倒有好处。但对入仕为官的士人而言,整个明代自初期以来对吏事的重视逐渐转化为对政事能力的推重,其中政治制度及官员考核制度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而其背后则是明道致用,经世济民思想的支撑。因此,文学之士始终没有受到人们想像的重视,后七子成员都感受了这种压力,但在政治现实面前他们仍然选择了文学之路。

三

一般说来,古代以官僚身份的文人,他们直接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是自然的事实。但我们认为不能从这种普泛的身份出发,而应从文人的政治精神入手加以考察,这样既可以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可获得对时代政治精神和文化的认识。嘉靖间刑部文学活动

① 《赵浚谷文集》附《永思录》,万历八年周鑑刻本。

②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献征录》卷92,第3989页。

③ 《归有园稿》卷2,明万历二十一年张汝济刻四十一年徐元祚重修本。

也须从政治精神的解读入手才能理解。

嘉靖间朝政多端,祸事不断,刑部结社的成员并未置身事外,而是以对遭受打击的官员表示同情,对当权者以不合作的态度出现。李攀龙、王世贞在刑部期间都表现出了不畏权贵的气节。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志铭》云:“有边将触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赂,必欲置诸辟,而竟不能夺之于鳞,从未减。后其人至大帅,果大著勋伐云。”^①王世贞“除刑部主事,岳岳风稜,持三尺唯谨。缙帅陆炳方贵幸用事,受巨珰指,匿奸校阎某,欲贷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转请脱,既复因执政徐公以请,公不许。因安令以事忤厂珰,坐蜚语抵罪。公廉知其冤,竟白之。”^②

王臣贞曾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谈到与严嵩的三次重大冲突:

严氏以切齿于先人者三。其一,乙卯冬,仲芳(杨继盛)兄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为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慧,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敛,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诃。其二杨(顺)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鍊,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③

这三件事中,二件事与王世贞父王忬有关,与王世贞有直接关系的是杨继盛事件。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疏劾论严嵩“十大罪”,被逮下狱。以王世贞为首七子成员吴国伦、徐中行纷纷援救,并时时至狱中看望。^④王世贞又为杨继盛妻子代拟代死疏,得罪严氏不浅。王世贞集中有《三杨诗》,为先后入狱的杨最、杨爵、杨继盛而作。三十四年,杨继盛被害,宗臣作诗哀之。嘉靖三十五年,吏部尚书李默被构陷下狱,徐中行拟轻典,不果。后来,给事、御史有缺,上报的名单中徐中行名在第三,但未得任命。王世贞在刑部任上也九岁不调,后虽得外任,然不过青州副使。

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复古派成员与严氏集团的冲突还是体现在文学上。尽管明代文坛自弘正以来,郎署官员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并承担起引领潮流的作用。但作为实际上政府首脑机构的内阁一直以来都以三杨所代表的集政治、道德、思想、文学几种权力于一身的体制为榜样,因此,尽管台阁集团的文学权力已基本丧尽,台阁大臣也不再追求以诗文号召天下,但严嵩是个例外。严嵩是弘治十年进士,与前七子一些重要成员是同年,曾与复古派诸子相互唱和。他的作品也获得了好评,李梦阳就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⑤随着政治权力的加大,他也不想主持风雅,成为文坛盟主。^⑥刚开始,严嵩对王世贞采取拉拢态度,但王世贞并不买帐。而随着政治上的对立,距离便拉开了,以至严嵩开始对刑部社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报复,王世贞等相继被排挤出

① 《李攀龙集》附录,第686页。

② 《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王文肃公全集·王文肃公文草》卷6,万历王时敏刻本。

③ 《弇州四部稿》卷123《上太傅李公》。

④ 参见周亮工《书影》卷2及王世贞《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碑》。

⑤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⑥ 关于这一点,当时人看得清楚,马之骏《彭太史苍雪斋诗集序》:“他如长沙之敏,分宜之忬,皆欲攘骚客之片长,踞四声之左席,而知者弗以异也。”(《玄远堂全集》文收集,天启七年刻本。)

京。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 119《宗子相》(又)云“顷闻政府此人云‘吾老,不分见轻薄少年。吾去之略尽,独竟余王某也。’家君颇郁郁,书来诮仆何状,作何策免。”《弇州四部稿》卷 127《俞仲蔚》云“仲蔚知吴明卿谪耶?坐以谈文章故。当事者几一网尽,然谓仆乃其魁焉,所深恨。”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亦云“相嵩者贪而伎,亦自负能诗,谓诸郎皆轻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继外补,或斥逐。”^①

为了争夺“风雅权”,严嵩不惜借引用唐顺之等以之相抗,^②陈懿典《郭张诗虚诗稿序》:“永陵中,李历城、王娄东六七八人执牛耳而号海内,海内靡然向风。当其时,分宜秉重,自以为作者。所推穀毗陵、晋江皆一时名流,而竟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然而,唐、王讲求实学,并转而讲心学,并不以文学为重,同时,他们为严嵩所拉笼主要是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非完全依附,故最终严嵩未能实现执掌文学权力的梦想。王世贞《浮湘集序》曾说“世宗时六七大夫讲业燕中,而不佞谬名,私其绪言,无可相继,得罪斥谪,或自引去,天下操觚之士避之吻齿外。”^③虽然刑部诸子在政治上倍受排挤,却声名鹊起,特别是王世贞居于吴中之后,影响最大。

政治对立和争夺文学权力的斗争交结在一起,遂使复古派中人士相继遭受打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还应注意嘉靖间另一场整顿官场的举措。《典故纪闻》:

嘉靖时,吏部尚书廖纪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公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遂其所欲。经故人急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④

《明史》廖纪本传只引录了廖纪关于人才当惜一段,由于所提建议与大礼议有关,嘉靖皇帝“但纳其正士风、重守令二事而已。”^⑤明代正士风士习之论自成化以来开始多了起来,这些并非无的放矢的空谈虚论,而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廖纪这里所言官场务虚誉、假恬退、假托养病致仕习尚在当时普遍存在,茅坤《寿云石郑侯序》:“近代以来稍稍声名相高,而吏业衰矣。”^⑥“声名相高”是弘治以来官场风气的一大变化,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文学之士。何良俊《许石城太夫人八十寿序》:“良俊观近代人有两等,其一强直有口,喜谈说当代,稍不合即肆意刺讥,其言亦便巧易售,一时人品高下视以为升沉,虽贵势人犹惮畏之,如茹物不下,须吐去耳。其一自度不能加入,遂甘心下之,媵媚琐尾,仅如妇寺,苟于得车,不论所舐,故当路亦喜为推毂。”^⑦随着官场风气的变化,正德以来遂形成两种习气,一则喜谈说古今,便巧易售,一则卑琐下贱,抚拍权贵,亦能得势。万斯同读弘治实录,感慨道“士风之变易也,岂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爱而尚名节、重廉耻,岂不

① 《王奉常集》文部卷 14,万历刻本。

② 《明文海》卷 271。相关论述可参观廖可斌《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诗稗鳞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7—194 页。

③ 《欧虞部集·浮湘集》卷末,清刻本。

④ 《典故纪闻》卷 17,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300—301 页。

⑤ 《明史》卷 202,第 5324 页。

⑥ 《白华楼续稿》卷 7,明嘉靖至万历年间递刻本。

⑦ 《何翰林集》卷 10,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岩精舍刻本。

诚忠厚之俗耶?及刘瑾一出,向时之大僚,遂蒙面濡首、争先屈膝而不恤。”^①易世同感,都认为士风之变起自正德。

士风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道德、风尚三个层面。朝廷对政治层面的变化比较敏感,如能引起上层注意,也会引发一些举措。顾璘养亲致仕在家,后起家为浙江参议、山西按察使,未上任。复起浙江左布政,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俱未之任。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养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銜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銜闲住,不许起用。”^②当然,这只是只是一个例证,事件背后也有较复杂的背景,但足以说明文学之士在政治权力体系遭到的排挤。庞尚鹏《龟川董先生诗集》:

夫士不能奋于时,多托诗以自见。若诗虽工而行不逮其言,即能诗,奚取焉?……昔人谓禄位不足以动人,孰肯传其书。夫书之不传,谓其言无可采耳。若真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孰得而废之?故山泽人著书多与六经并传,彼王侯卿大夫好古探奇,诗必唐,文必秦与汉,乃有终其身求一言几乎道而不可得者。竟与时销灭耳,其于禄位何与哉?^③

庞尚鹏对文学之士的轻视是一贯的,不过他的两点指斥也是相当有力的:一是文学之士并无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二是终身好古探奇,然于身心性命之学十分疏远。

一方面,是由政治斗争和争夺文学权力引发的对七子的排挤和打击,另一方面,正德以来对朝廷政治风气的关注也造就了朝廷对官员不修职业,虚名延誉现象大加挹伐的政治气候。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之士在朝廷上倍受打击,政治上受到排挤。即使严嵩倒台,张居正执政后,王世贞也依然没有受到重视。

四

刑部结社期间,诸人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官场的批评,故王世贞很注意在文章中加以辨护,如《弇州四部稿》卷55《送王员外新甫视广西学政序》云:

夫新甫向以老于吏也,又老于文。昔者夫子没微言眇,申韩之徒务于切名实,其所著《孤愤》、《说难》诸篇极人巧,夺天致,摩揣幻变百出而不乱,以文发吏术,亦甚难哉!工此而吏者缘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缘吏近事而远道,君子病之。新甫兼习俩至,称能法与儒家言,其道术足发也,其于吏术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谓工于吏与文之外者也。

文中这类以事实说明文学与吏治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弇州四部稿》卷55《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又从理论上加以阐释:

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尔。《三百篇》,诗之大宗也。盖《豳风》、《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变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虫草木,摭取验焉。以厚劝民,而上下之相爱,父子夫妇之相保,祭祀之以时,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轧,而众知治之道矣。

① 《石园文集》卷5《读高铨传》,民国二十五年张氏约园刻四明丛书第四集。

② 《典故纪闻》卷17,第309页。

③ 《百可亭摘稿》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用《诗经》的经典地位为文学创作提供辩护,认为文学可以提供一个表现“民事”的空间,此即治道之所在。更进一步他还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解释了由文学向吏政转化的可能,但为什么文学创作之心包含了吏事的可能,在此文中他并没有展开,《张肖甫诗集序》(《弇州四部稿》卷 68)弥补了这层意思:

夫文章之与吏道,其究若霄壤然。然其精内通而无所不容者,物情也,故辞士之为辞,以所见无非辞者,必欲求高吾思,远出于物情之表而后快。法吏之为法,以所见无非法者,颠倒束缚于三尺之末,而不能求精于物情之变而后安,彼无论其不相通而已。其所以为辞者偏,而所为法者拘也。

求精于诗,得物之情而远出于物情之外,与法吏专拘于法不可同日而语,二者可能会陷于偏、拘之弊。但文学“其精内通而无所不容”的特点使其能够得于物之情,这一些点与政事通物之情有相通之处,故而仍是高于单纯的吏事。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 65《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对唐诗之盛与明诗之不振提出了独到见解:

在昔唐宋时,朝士大夫称得罪去者往往屈为荒远郡佐、员外署置,其禄虽有之,仅自给妻子耳。为之上者不以责其吏能,为之下者亦不谓其能吏我。以故鲜钱谷法比、簿书期会之烦,其余日足以为之地,而竭其工于诗。虽其诗之工,然不过以之发其羁旅无聊、磊落不平之思而已。其山川之奇丽则辱之而为险恶,风日之骀荡则辱之而为惨悽,以致物候之稍偏,而民俗之稍异,则辱之而为瘴为疠,为魑魅魍魉,若不可一朝居者。如沈、宋、元、白、刘、柳诸君子之言固具在,其探幽造微,穷变尽态,固不可以余说以废其工,然要之有出于叹老嗟穷、忧谗畏讥之外者乎?有能如风人之所谓可以兴,可以群且怨者乎?明世则不然,士大夫坐谪者仅少镌其秩级,而不限以地之远近。为之上者少优以礼而不废其事,为之下者以叙迁之吏待之,而忘其端。其外既有所縻于职,而内又无所大概于念,宜其人之工事而拙言也。夫明之诗诚不足以拟唐之工,然于臣子之节亦即修矣。而余乃复交致其不满者,何也?之唐而使风人之义逾也,之明是使天下无风人也。

唐宋士大夫遭贬之后无吏事烦扰,闲暇之际足以为诗以抒写其情怀,而明代士大夫则有职事牵系,不能专心于诗。二者各有利弊,在唐代是诗少“风人”之义,缺乏现实关怀,而明代的现实则会造成没有诗人的局面。当然,这只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发现,在他的思维逻辑之中,诗歌与吏事是分而不合两件事,工于诗歌是由于无钱谷法比、簿书期会之烦扰,修臣子之节、羁縻于吏事则诗歌不能工。这还是一种文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从吏治出发的政治思维。当然,这仍然是儒家“风人之义”文学观念影响下的文学观。不过,这种独特的诗人思维倒为我们揭示了王世贞心中文学、政治孰重孰轻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才是他思想的核心。王世贞的文学创作活动在经历其父王忬惨死,兄弟同归守丧的打击后,也一度达到高潮,创作了明代最为有力的乐府诗。但总体来说,后七子的文学活动开始走向另一个层面,既不复前七子的慷慨激昂,怀抱伟大理想,也不像唐宋派中多以讲求实学名世,而走向以诗文名世,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考是时公既在野,薄文章不为,孜孜研求经世之学,而张居正则默处禁中,考索国家典章及兵食诸籍。惟王、李(言尧言尧)以诗文号天下。”^①相比之下,王世贞自居吴中,建弇山园,主盟文坛,诗酒往

^①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来,风流潇洒,并非只是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后反应,而是其思想的必然延伸。

明初以来,文人思想中的政治思维、行为方式、道德操守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是体制下的生存,执守法律,战战兢兢,克身守己,不敢越雷池一步;弘治以来,郎署官员表现出理想主义的政治精神,敢于斗争,不畏权贵,以一种激越的政治气节投身政治,但多以失败告终;嘉靖初,一批官员讲求实学,积极投身政治,但亦多以直谏去职。于是,除了官场风气败坏之外,流连诗酒,以声名相高也成为一时风尚。茅坤《寿云石郑侯序》:“国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时吏治尚朴茂,宣德、弘治间右继体,故其时吏治务恩泽。近代以来稍稍声名相高,而吏业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与各矜其功能以赴天下耳目之向。”^①这个疏理符合吏治的历史发展,明代的政治风尚屡经变迁之后,对政治的无奈、失落,便促成一大批有理想和志向的官员另寻出路,而文学是一个相当有诱惑力的选择。

对于政治现实,他们都有清醒的认识,王世贞曾回忆起官于刑部和任青州副使时的情形说:

世宗朝纵出沮格之法严,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国有司争相趣为刻深。而不佞尝承乏西曹郎,获治京兆都官狱,数抱案争尚书前,有所覆出不能夺。寻奉命北察畿辅囚,得以纵观先后成狱,不佞时有所谏释。因窃自叹,异时获备监司一方,庶几千古,所谓无冤民者。而最后迁兵备副使,治青州。属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尽承;守令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无同异,以故不佞所伸十恒仅七八,而彼见以十屈其二三,几用睚眦中法谪。自余罢青州归而伏里中,而后愧悔之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获伸其一,即奉其一以去,而何澳涩至二三为?然窃伏覩诸监司即未有不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为可,一谏驳而问者如故,再移案而它问者如故,三移案而谤随之。吾持异而不能胜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者不以为可,吾成一狱而见驳,再成狱而驳加峻,三成狱而怒随之。吾求同而不能胜其异,则所谓监司者兢兢幸以亡害迁,夫安见奉其一不伸而去也?^②

为京官时,抱案牍争于尚书前,也颇能坚持。因此设想监司一方时做出千古之事,做地方官虽也能伸雪一批案件,但仍不能以一己之力胜官场之同,令人心意不畅,颇有屈辱之感。为官的艰辛一言难尽,事后回忆起来,既未守志,亦未能坚守为官之旨。政治就是这样,充满无奈和屈辱,无可选择。宗臣在朝期间写有著名的《报刘一丈书》,对朝臣之无耻行径做了无情的揭示,盖源于他对现实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陈益祥《木铎》引宗子相曰:“今缙绅先生雍容云霄,坐期鼎鼎,视国家利害若罔闻知。不当事者委之分有所拘,当事者又委之势有所制,惟取夫不切利害,无关身家者稍稍补缀,便已赫然称才。”^③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权奸当道,而是整个官僚体制的腐败,正直士大夫无所作为,这对他们的政治精神心态的影响可能更大。

于是,企慕隐逸之风盛行于世,而既为俸禄而来,也只能吏隐于朝,还是躲不开政治的纷争。王世贞《初夏西园偶成》:“仕隐俄更荡,动静竟难调。持镜问朱颜,那能忘不彫。”欲吏隐于朝,却动静难调的局面,很难获得心灵的平静。《初晴园亭即事偶书所怀》:“天

① 《白华楼续稿》卷7,明嘉靖至万历年刻本。

② 《弇州四部稿》卷59《赠兵备副使广平蔡公迁督山西学政序》(又)。

③ 《陈履吉采芝堂文集》卷13,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卷16配钞本)。

地意无常,吾人宁久安。今兹幸休暇,聊与为盘桓。……顾见清池影,茫然愧衣冠。区区丹阳设,欲以敌东山。不见先民语,富贵多忧患。忧患从机发,那得借余欢。乔木恶崩岨,根株离见难。”^①即使是休暇之际也难获平静,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而共同的文学追求却给了他们混乱现实一帖心灵抚慰剂。王世贞《结交行赠李于鳞诸子》:“吾侪此聚若有神,骊珠荧荧夜光溢。但忆论文碣石空,宁知凿窍高天嫉。即令偃侧荒城畔,残月犹明梦迴室。饥鸢冻鸱慰相语,丹凤哀呼问其匹。”^②即使冒着得罪高官的风险,也以文学相互嘘寒问暖,所谓“宇宙之内何可着眼,欲寻一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数人镇日相对,便足千古”,^③“夫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④这两段话正道出了刑部社中诸人的共同情怀,同为天地之英华,文学可以“千古”,不必政事。李攀龙也认为“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⑤这种退一步的想法在士人当中是很普遍的。王世贞遭家难辞职归乡之后曾说“仆自顾已矣,驽钝之才不复受鞭策矣!需次垂及,冒滥一官,请告而归,买小舟期足下游行名山大川,不问所向,遇好便留,博其所见闻之奇落可爱可骇者……而后归,归,追而力古先所以作者之旨,而后发于文若诗,庶几哉足以成一家言,毕吾事耳。……壮心不已,亦非仆所信也。请置功名二字勿道,士君子有出于功名之外者,足下其熟思之。”^⑥力追古作者之旨,发于诗文,成一家之言便为他的人生目标,功名早已置之度外。不只王世贞,刑部社中诸子也都怀抱着同样的想法,李攀龙就说过:“夫玩世之为大于辟世也邈矣,不佞弟才僻,似可足辟世耳。自视无长兄之通才,将何以出而玩世邪!”^⑦玩世生活态度到了万历以来才成为文人的选择,正德、嘉靖以来,避世即厌恶官场习气之风开始出现,李攀龙的选择代表了刑部社中诸子的心声。我们看到刑部社中诸子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并以此相互标榜,引为同道,这是他们结社的主要原因。宗臣《五子诗》写出这种同道之感,《梁比部有誉》:“结束长安陌,聊以寄薄游。中怀既不开,兀坐生羁愁。俛仰一世间,局促何所求。郁郁遂成篇,灿灿云霞流。凌厉起高唱,作者徒悠悠。人生易奄忽,焉得无深谋。黄庭一以悟,万事良蜉游。振衣驭天风,长逝不可留。咄咄迷途客,栖遑良足羞。”虽京城为官,但“中怀”抑郁,理想的失落和政治的失意促使他们重新制订人生目标,既然人生飘忽,又不愿随人求官,文学便成为他们寄托人生的手段和目标。《徐比部中行》写徐中行“冠盖岂不荣,而独耽著述。结藻何翩迁,札札弄缃帙。驾言发艺林,彷徨求侣匹,只言不中谐,怅望如有失。”^⑧耽于著述,发于艺林是他们的共同追求,求同道以相激励,以壮声势便是必然的了。

(作者通讯地址:张德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二诗均见于《弇州四部稿》卷 11。

② 《弇州四部稿》卷 17。

③ 《弇州四部稿》卷 118《徐子与》。

④ 《弇州四部稿》卷 57《赠李于鳞序》。

⑤ 《弇州四部稿》卷 71《王氏金虎集序》。

⑥ 《凤洲笔记》卷 7《答陆象孙》,明黄美中刻本。

⑦ 《李攀龙集》卷 29《与许殿卿》。

⑧ 《宗子相集》卷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